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1.017

# 政治想象的三副面孔:19世纪中叶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叶名琛形象

季念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19世纪中叶的《伦敦新闻画报》塑造了“顽固不化”“残忍嗜血”“渊默镇静”的叶名琛形象。该形象的构建处于文本间性与图像间性的合力之下,体现了该报与《泰晤士报》及政治语境中声音的回响与共振,借助新闻“内文本性”实现的意义再生以及叶氏肖像与其他画像在互文中生成的可能意涵。该形象的生成缘于该报在“英国性”主导下的表征:它受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商业利益的驱使,承载着捍卫帝国荣誉与尊严的使命,也出于对英国民族优越性的鼓吹。它对考察西方新闻文本中的中国人形象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伦敦新闻画报》;叶名琛形象;政治想象;图文关系;英国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1-0124-09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两广总督兼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在中英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史稿》述评叶氏“性木疆,勤吏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最后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为其盖棺定论<sup>①</sup>。迄今,史学界对该时期英国舆论中叶名琛形象的探讨主要有黄宇和的著作与舒小昀、马亦男的论文,为研究叶名琛提供了可贵的视角<sup>②③</sup>,但考察的英国报道数量少、时间短,来源均为日报。两者均未关注在19世纪中叶开启了“英国插图报刊史上一个新时代”<sup>④</sup>并在周刊发行量中独占鳌头<sup>⑤</sup>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后文简称为“《画报》”或“*The ILN*”)。《画报》中涉及叶名琛的

报道密度较高,时间跨度较大,体裁多样化,为研究英国媒体中的叶名琛形象提供了丰富的文本。研究《画报》中的叶氏形象,剖析其具体表现和艺术特点,探寻其被表征的过程和规律,挖掘其生成原因,既能对史学界的叶名琛研究作出有益补充,又能为理解西方新闻文本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启示。

## 一 文字与肖像的互逆:叶名琛形象的多面展现

1856年10月8日的“亚罗号”事件被英政府作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事件本身只是“中英关系史上不大的冲突”<sup>⑥</sup>,当时的在华英文报纸与英国本土报纸均未予以特别关注<sup>⑦</sup>。但是,《泰晤士报》从1856年12月29日起,对“亚

收稿日期:2022-07-23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JD64)

作者简介:季念(1982—),女,四川达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

①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764、11766页;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载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②Wong J Y.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53-173.

③舒小昀,马亦男:《从“广州屠夫”到“六不总督”——英国人眼中的叶名琛形象》,《英国研究》2011年第3期。

④Williamson C N. “Illustrated Journalism in England: Its Development. —I”, *The Magazine of Art*, 1890(bound edition): 298.

⑤Bourne H R F. *English Newspapers: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887, p. 226.

⑥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4页。

⑦在华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于1856年11月1日简要提及了“亚罗号”事件。《泰晤士报》首次提及该事件时也仅摘录了《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刊登的信件,参见“*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Times*, 1856-12-18: 5.

罗号”事件及英中军事冲突展开了连续报道。《画报》紧随其后,在1857年1月3日的《炮击广州》和相关社论中将“亚罗号”争端完全归咎于中方<sup>①②</sup>。叶名琛也以“叶总督”(Governor Yeh/Viceroy Yeh)、“大臣叶氏”(Commissioner Yeh)<sup>③</sup>、“叶”(Yeh)的称号频频见于《画报》。《画报》以明确的政治主张、鲜明的编辑观点,围绕“亚罗号”事件及其后的中英军事冲突、叶氏镇压洪兵起义等,塑造了“顽固不化”和“残忍嗜血”的叶名琛形象。此二者影响了19世纪中叶英国人对叶名琛的印象,这种印象也进入了英国对于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中。《画报》中的叶氏肖像在一定意义上与文字形象偏离,描绘了“渊默镇静”<sup>④</sup>的叶名琛,但终究未能进入主流话语。

### (一)“顽固不化”的叶名琛

自1857年初至1858年2月,《画报》在消息、通讯、社论中提及“顽固不化的叶氏”多达20余次,反复强调他是一切争端的始作俑者。

1857年1月3日的消息《炮击广州》强调叶氏的顽固强硬是英军炮轰广州的导火索。开篇首句将广州被英军炮击归咎于中方,第二句则将中英外交齟齬归于广州总督的固执昏聩。紧接着,报道简述了中国官员扣押悬挂英国国旗的“亚罗号”,俘虏船员并将其中四人斩首等事件。更多篇幅用于叙述叶总督对英方要求置之不理,导致后者“迫不得已”炮击广州城。同期的社论也复述了叶氏始终忽视英方请求并拒绝道歉:“态度顽固”地对待英方抗议;“顽固不化”地拒绝面谈;在英方进一步轰炸广州之后,他“仍然顽固不化”<sup>⑤</sup>。

由此开始,《画报》重复用“顽固”或其同义词

指称叶名琛。几乎所有的社论、通讯,都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总督的顽固不化是造成这场灾难的全部原因”<sup>⑥</sup>,顽固排外的叶氏是英中关系恶化的始作俑者<sup>⑦</sup>，“叶氏——一个既故意作梗又顽固不化的人——应对所造成的一切恶果负上全部责任”<sup>⑧</sup>。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俘并由英舰“无畏号”(HMS *Inflexible*)送至印度加尔各答。《画报》于5月1日刊登的报道中引用清帝上谕,斥叶名琛“刚愎自用,顽固不化,倒行逆施,肆无忌惮,完全无视其高位的职责”<sup>⑨</sup>。由此,“顽固不化的叶氏”不再是《画报》单方面的观点,而是清帝“上谕”对叶名琛的定调。

### (二)“残忍嗜血”的叶名琛

从1857年1月起,《画报》中有十余次直接用“残暴”“嗜血”“血腥”“暴虐”等词形容叶名琛,塑造了“残忍嗜血的叶氏”形象,并着重突出两个方面。

一是用叶氏处决的中国人人数之众来证实其杀人如麻,强调其天性嗜血,以激发英国读者对他的憎恶。从1857年1月至1861年6月一直如此。《炮击广州》直接指出“叶氏以残暴(barbarity)著称”,“在叛乱(1854年夏于广东爆发的洪兵起义,笔者注)的六个月间,仅在广州城内经他处决的就不止10万人”<sup>⑩</sup>。在通讯《与中国的战争》中,记者直言叶氏具有“嗜血的天性”(bloodthirsty propensity)<sup>⑪</sup>;类似的还有如“最为残忍嗜血的野蛮人”<sup>⑫</sup>、“凶残血腥”<sup>⑬</sup>等表述。在社论中提到叶氏“在他管辖的广州城内屠杀了7万名中国人”<sup>⑭</sup>,可见叶氏何等“毫无道德、嗜血成性”<sup>⑮</sup>!在叶氏

①“The Bombardment of Canton”, *The ILN*, 1857-01-03: 664.

②“London, Saturday, January 3, 1857”, *The ILN*, 1857-01-03: 669.

③“Commissioner Yeh”是“Imperial Commissioner Yeh”(钦差大臣叶氏)的简称。

④英军入侵广州后,时人讽叶名琛“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5页。此处仅借用“渊默镇静”形容肖像中的神态。

⑤“London, Saturday, January 3, 1857”, *The ILN*, 1857-01-03: 669.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后文均循此例。

⑥“Saturday, January 10, 1857”, *The ILN*, 1857-01-10: 6.

⑦“The War with China”, *The ILN*, 1857-01-17: 38-39.

⑧“The Chinese War”, *The ILN*, 1857-02-14: 127.

⑨“China”, *The ILN*, 1858-05-01: 447. 此处引用“上谕”,与史料记载一致:“叶名琛以钦差大臣,办理夷务……实属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大负委任,叶名琛著即革职。”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3页。

⑩“Bombardment of Canton”, *The ILN*, 1857-01-10: 6.

⑪“The War with China”, *The ILN*, 1857-01-17: 38.

⑫“Notes of the Week”, *The ILN*, 1857-02-21: 161.

⑬“Turbu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ILN*, 1857-03-14: 232.

⑭“The Chinese Debates”, *The ILN*, 1857-03-07: 223.

⑮“London, Saturday, September 18, 1858”, *The ILN*, 1858-09-18: 256.

死讯中再次提及他“将其10万同胞斩首”<sup>①</sup>。在社论《英国的对华政策》中则有“叶氏供认,他在十二个月内屠杀了400万叛军”<sup>②</sup>一语。19世纪英国的报纸“积极维持并参与了知识和权力的话语生产,从而产生了当时的‘真相’”<sup>③</sup>。由数据堆叠起的叶氏狞恶嗜杀的“真相”又构成了手段暴虐、天生嗜杀的叶名琛形象。

二是不时提及叶氏仇恨外国人,长期悬赏西人首级,令英国公众惶恐不安。从1857年1月3日至3月14日,《画报》反复提及叶总督“说英国人是与叛乱分子和不法分子相勾结的……宣布不加区别地悬赏英国臣民的生命”<sup>④</sup>;叶氏在全省范围内悬赏,要求人们解外国人首级赴其署呈验<sup>⑤</sup>;还借记者之口,道出“中国人唯一的攻击性行为是由叶氏悬赏我们首级的凶残布告引发的”<sup>⑥</sup>。两篇题为《在中国的战争》的通讯先后报道了粤港两地西人的危险处境,包括清军舰袭击英国船舶事件、1856年12月30日十一名欧洲人被杀的“提斯特尔号”(Thistle)事件、1857年1月中国人在黄埔洗劫西人仓库屋舍事件、对西人面包投放砒霜的香港“毒面包”案等,认为这些都是因叶名琛悬赏“蛮夷”首级而激发的“最深重的罪行”<sup>⑦⑧</sup>,令读者不得不恐惧其对付英国人的手段。

### (三) 渊默镇静的叶名琛

1858年2月13日,《画报》增刊首页刊登的叶名琛肖像,是通讯《在中国的战争》的插图之一(图1)。这是叶氏肖像唯一一次见于《画报》。图中叶氏样貌较为年轻,配顶戴花翎,颈挂朝珠,身着朝服,丰颊长眉,泰然自若,与《画报》在文字报道中反复塑造的顽固不化、残忍嗜血的叶氏差若天渊。若从图像写实、文字写情的对立来解释叶氏肖像与文字形象之间的差别,那么“顽固不化”“刚愎自用”等特征的确难以图像化<sup>⑨</sup>。但是,

就连在一定程度上能被视觉化的“残暴嗜杀”都于肖像中不露纤毫。记者的声明位于末页:“我寄回的肖像应该值得信赖,因为它临摹的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本地艺术家的画作。”<sup>⑩</sup>这在很大程度上规约了肖像的写实性。读者先见图,后读文,又翻回至首页,再次揣摩插图,更能感受到肖像与早已在文字报道中定型的叶氏形象之间的明显错位和强烈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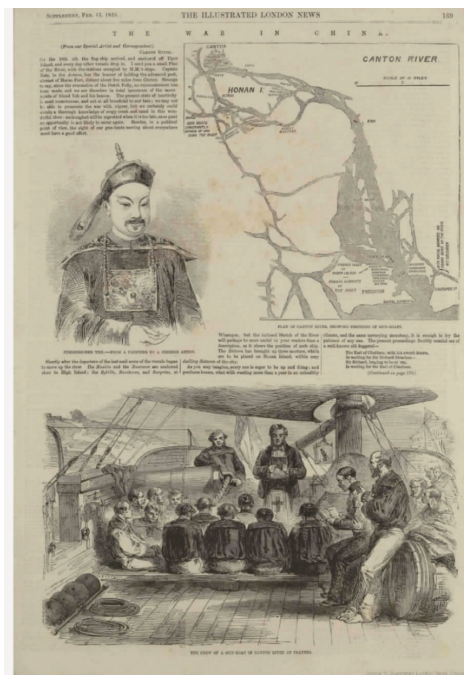


图1 《大臣叶氏——来自中国画家的画作》(左上), *The ILN*, 1858-02-13:169

《画报》插图的位置、题注、周围的文字等都“合力为图像提供语境”并生成特定的信息<sup>⑩</sup>。该通讯中图文合力营造的氛围也使叶氏形象中的“恶魔感”得以弱化。文字报道除了简要介绍英

①“Foreign and Colonial News”, *The ILN*, 1859-06-11: 554.

②“British Policy in China”, *The ILN*, 1861-06-22: 584.

③Leps M C. *Apprehending the Criminal: The Production of Devi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Discours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15.

④“The Bombardment of Canton”, *The ILN*, 1857-01-03: 664.

⑤“Bombardment of Canton”, *ILN*, 1857-01-10: 6.

⑥“The War in China”, *The ILN*, 1857-02-21: 172.

⑦“The War in China”, *The ILN*, 1857-03-07: 200.

⑧“The War in China”, *The ILN*, 1857-03-14: 251-252.

⑨季念:《〈伦敦新闻画报〉中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图文表现艺术》,《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⑩“The War in China”, *The ILN*, 1858-02-13: 176.

⑪Anderson P J. *The Printed Ima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1790 - 1860*. Vancouver: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89, p. 75.

军舰的部署之外,更记叙了记者在珠江和广州太平山寺庙的见闻,接近于体验中国自然风光与世风民俗的“风貌通讯”,语言随意,笔调轻快,洋溢着欢乐的情绪。在此语境中,文字虽三次提及叶名琛,但都未直接表达对他的鄙夷、痛恨或恐惧,而是略带调侃之感,如称其为“老朋友叶氏”,说“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和耐力”,甚至在提及中国人埋下地雷“以期尽可能多地炸死‘番鬼’”时也将“叶氏亲自督办此事”一笔带过,并未附加“血腥残酷”等形容词。尽管有“叶氏依然固执”<sup>①</sup>一语,但“固执”一词用了“stubborn”,而非以往《画报》上出现得最多的“obstinate”。虽然两词均表“顽固不化”,但“obstinate”偏重于表示为了让别人难受而罔顾劝说,拒绝改变自己的意见或行为,比“stubborn”带有更浓烈的负面情感色彩<sup>②</sup>。此处用“stubborn”无疑与整篇通讯的氛围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叶氏形象中令人鄙夷痛恨之处。

叶氏肖像与通讯的另两幅插图同版。肖像居版面上幅左侧,尺寸最小。其右侧《展示炮舰位置的珠江平面图》仅用文字标注了英法军舰在珠江水域的位置。肖像背景中木雕的线条已经延展至平面图内,两图似相互交融,给人以叶总督面对广州城外陆续就位的英法军舰却胸有成竹、从容淡定的观感。下方插图描绘了英国水兵在珠江舰艇上祷告的情景,烘托出温馨感。尽管肖像迥异于常见的叶氏形象,却与本篇报道的文字文本和同页插图在审美及情致上达到一致。

## 二 文本间性与图像间性的合力:叶名琛形象的建构艺术

《画报》在对叶名琛形象的建构中,既将本报记者见闻和其他权威报纸已刊信息、重要人物的往来信函、议会辩论记录等整合起来,归纳生成

“真实故事”,又综合运用多种体裁的新闻文本,以新闻评论呼应新闻报道,用新闻事实支撑社论观点;既与同时期影响较大的报纸及其所处的政治语境对话,又自我引用、重复和修正;体现出文本间性与图像间性的合力。

### (一) 外部声音的回响共振

在对叶氏的描述上,《画报》与同时期独霸英国日报业的《泰晤士报》、英国在华外交人员以及巴麦尊内阁基本保持一致。

《泰晤士报》直言“广州总督叶氏是清帝国内最可恶、最残忍的人之一”<sup>③</sup>。它多次提及叶氏的顽固不化<sup>④⑤</sup>;刊载了指控叶氏将7万多人斩首的“读者来信”<sup>⑥</sup>,报道了“提斯特尔号”事件、香港“毒面包”案和外国平民无端丧命事件等<sup>⑦⑧⑨</sup>,并用“血腥的”(sanguinary)和“嗜血的”(bloodthirsty)形容叶氏<sup>⑩</sup>。《画报》作为周刊,则有更充裕的时间去获取和处理新闻。其出版的“延时性”暗示它的声音“比竞争对手的更令人信服”,更“接近真实”<sup>⑪</sup>。因此,《画报》对《泰晤士报》中叶氏形象的复呈具有双重作用:一则它能“勘验”日报已刊文本中的叶氏形象并作出“仲裁”及再次确定;二则它也利用权威性日报对叶氏的报道来支撑和肯定自身所构建的叶氏形象。

《画报》中的叶氏形象还与政治语境中的叶氏形象交相呼应。其一,它延续了与叶氏交手颇多的英国外交人员笔下的形象。例如叶氏的老对手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不仅将他视为清廷仇外排外的代表人物,还对他的冥顽不灵恼恨交加,称他为“顽固的化身”<sup>⑫</sup>。其二,《画报》中的叶氏形象也与巴麦尊内阁极力塑造的叶氏形象同频共振。巴麦尊称叶名琛是“使一个国家蒙羞的最野蛮的野蛮人之一”,说他“犯下了一切贬低人性的罪行”。他借叶氏处决洪兵俘虏的数据凸显

①“The War in China”, *The ILN*, 1858-02-13: 176.

②参见 stubborn 和 obstinate 词条,莉主编:《牛津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英汉双解版》,孟庆升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1274—1275 页。

③“Foreign Intelligence”, *The Times*, 1857-01-26: 10.

④“The Bombardment of Canton”, *The Times*, 1857-01-02: 6.

⑤“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Times*, 1857-01-24: 7.

⑥“The Affair at Canton,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he Times*, 1857-01-21: 6.

⑦“The Chinese and Persian Wars: China”, *The Times*, 1857-03-02: 10.

⑧“The War in China”, *The Times*, 1857-03-04: 6.

⑨“The English in China”, *The Times*, 1857-03-03: 5.

⑩“Foreign Intelligence: Austria”, *The Times*, 1857-03-14: 10.

⑪Sinnema P W. “Representing the Railway: Train Accidents and Trauma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 1998, 31(2): 142-168.

⑫Bowring S J., Bowring L B. *Autobiographical Recollections of Sir John Bowring*. London: Henry S. King & Co., 1877, p. 221.

叶氏的非人性和反人道：“……在短短几个月中，有7万颗人头——中国人的头颅——被野蛮的叶氏的刽子手砍掉了。”<sup>①</sup>《画报》转载的巴麦尊致蒂弗顿(Tiverton)选区选民的声明称叶氏为“粗野无礼的野蛮人”，斥责他“侵犯了英国国旗，破坏了条约约定，悬赏在中国土地上的英国臣民的人头，并计划用谋杀、暗杀和下毒的方式灭绝他们”<sup>②</sup>。可见，在将叶名琛的残忍嗜血从处决中国人引向“灭绝”不列颠民族这一点上，《画报》的论调与首相始终一致。《画报》中的叶名琛形象是在与多来源文本的“互文”中被强化的顽固不化和残忍嗜血形象的并置。

## (二) 内文本性的意义再生

《画报》在对叶名琛形象的建构中，将已刊登过的文本置于意识形态倾向更明确的语境中加以隐蔽的改造而实现意义的再生，体现出较强的“内文本性”，即新闻文本通过自我引用或自我指涉，将自身的先驱文本作为客观事实及默认的前置语境而构成的深藏的文本间性。

这种“内文本性”在《中国的恐怖暴行》中尤其明显。该文全文引用了已于1855年11月17日刊登的同名报道，包括：

“自2月以来，在这小块空地上，刽子手们已砍掉了6万至7万颗人头。除了初一、十五和皇帝寿辰那三天之外，每天都有150至800人被同伴用筐子抬着，去看几分钟前被抬走或拖走的残骸，直到地面变成几英寸厚的污秽的血泥混合物。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人被绑在十字架上。刽子手面朝这些可怜虫，用一把利刃迅速切割他们身体的不同部位，最后将刀插入他们的肝脏。然后他们被砍倒，头、手、脚被砍下，肝和心被剜出，连同头颅一起呈给官员们看。”<sup>③</sup>

文中用广州刑场被处决者之众和行刑手段之惨烈，尽数展现了中国官员的“恐怖暴行”。在重刊时，原文被作为新闻背景，提供确凿证据。编辑在新增的按语中直陈，重刊的目的是要给“在议

会内外的叶总督崇拜者”和“出于派系之争及不爱国的目的，将中国人说成是……最人道和最文明的人”看看，叶总督究竟是怎样的“血腥恶魔”。如此一来，尽管原文中并未出现叶氏大名，但这6万到7万条人命也被顺理成章地归至他的名下。

该文在1855年初刊时，还配有题为《广州刑场》的素描插图。该图采取俯瞰视角，呈现了一处后巷的远景，未涉及任何行刑场面。画面衰颓苍凉，具有“如画”的美学效果，将文字带来的恐怖感中和掉。1857年虽未重刊此图，但编辑在按语中透露，为了避免“如此残忍、恶心、可怕的场面”震撼读者，首次刊出时特意省略了图中描绘的活人和遗体<sup>④</sup>。好一个“留白”！一则读者受按语引导，可借由文字描述想象惨不忍睹的场面；再则即使读者翻出1855年插图，所见的无非是苍凉但不血腥的画面，便更能被引发好奇：原图究竟可怖到何种程度以至于编辑要特意抹掉一些元素？对叶氏究竟还能如何残忍、恶心、可怕便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 (三) 图像间性的可能意涵

《画报》上的叶氏肖像迥异于“顽固不化”和“残忍嗜血”的叶氏形象。同时期另有多幅与文字中叶氏形象更为贴合的画像在英国流传。由于各画像的主体一致，出现时间却有先后，便潜在地构成了一种“互文”，即不同图像多次表征同一人物或事件时所形成的“图像间性”<sup>⑤</sup>。若把每幅画像都视为对同一主体的阐释，那么经由多次阐释的主体，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均被加强；被不同版本的画像重复表征的特定“套式”则成为固定在读者记忆中的主体形象。因此，尽管《画报》上的叶氏肖像与众不同，但其独特性和重要性不可避免地被“图像间性”所消解。

1858年，英国本土流传最广的应是由英海军陆战队克利乐少校(Major Crealock)于1858年1月叶氏被俘时绘制的侧像速写(图2)，图中叶氏眼露凶光，表情狰狞。《画报》在19世纪中叶“最严肃的竞争对手”——《插图时代周刊》(Illustrated Times)也分别于同年2月至5月刊登了三张叶氏的大幅画

<sup>①</sup>“Lord Palmerston’s Speech, fourth night on ‘China’ in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March 3, 1857. Series 3 Vol. 144. Column. 1811, 1822. Available at: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857/mar/03/resolution-moved-resumed-debate-fourth>.

<sup>②</sup>“Tiverton—Lord Palmerston’s Address”, *The ILN*, 1857-03-28: 281.

<sup>③</sup>“Horrible Atrocities in China”, *The ILN*, 1857-03-07: 204. 初次刊登见“Horrible Atrocities in China”, *The ILN*, 1855-11-17: 592.

<sup>④</sup>“Horrible Atrocities in China”, *The ILN*, 1857-03-07: 204.

<sup>⑤</sup>Thomas J. *Pictorial Victorians: The Inscription of Values in Word and Image*.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8.



像(图 3—图 5)<sup>①</sup>。图 3 和图 4 中的叶氏高鼻深目、虬须虎眉,不似汉人;图 5 为全身侧像,据称结合了鲁斯(M. Roux)的素描和克利乐少校所绘肖像<sup>②</sup>,故其五官与图 2 非常相似,只是眼神和表情中的狰狞感稍有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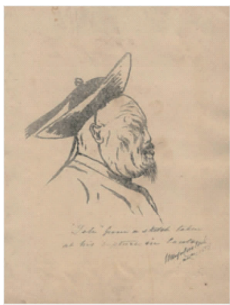


图 2 《叶氏,他于广州被俘时的速写,H·H·克利乐绘,1858 年 1 月》,来源:<https://m2.bonhams.com/auctions/26404/lot/35/#/>!



图 3 《大臣叶氏——由法国驻华使团随员德雷维兹侯爵的素描绘制》, *Illustrated Times*, 1858-02-27: 165.



图 4 《大臣叶氏被带到全权代表面前》, *Illustrated Times*, 1858-03-20: 221.



图 5 《大臣叶氏》, *Illustrated Times*, 1858-05-01: 312.

《画报》的叶氏肖像见报时间应早于克利乐少校所绘侧像流回英国的时间,很可能为英国读者提供了一睹叶总督尊容的首次机会。它既与后续几幅西人笔下的画像风格迥异,也不同于当时广州流行的以琳呱作品为代表的中式油画肖像风格<sup>③</sup>。总体而言,它展现的是眉清目秀、儒雅镇定的清朝汉臣形象。而图 2—图 5 中叶氏的相貌细节虽有差异,但在与《画报》上肖像的比较中见出其共性,即叶氏的神情或阴郁或倨傲,都更贴近“顽梗暴虐”的形象。这些画像的作者似乎遵循了已被共同认可的叶总督的外形特征(浓密的髭须、厚重的面部轮廓和肥硕的身材)以及标志性服饰(官帽)等类似“套式”,一再重复,使画像成为“符号形态”<sup>④</sup>: 其被共同规约的“所指”(叶名琛)不被“能指”(画中人)的细节差别所影响。因此,这四幅画像几乎具有了德勒兹所言的“柏拉图式重复”的意义,让读者“以预设的相似性或同一性为立场来思考差异”<sup>⑤</sup>,并反复确定差异背后的原型均是叶名琛。在“图像间性”的作用下,《画报》中叶氏肖像的独树一帜成了不入主流,被其他图像在重复中不断确定的“套式”所颠覆,难以让读者认可它是对叶氏形象的写实性表达。

①据查证,图 3 和图 5 转载自同年 2 月 13 日和 4 月 17 日的法国《世界插图报》(*L'illustration Journal Universel*)。

②“Yé, Ex-Gouverneur de Canton”, *L'illustration Journal Universel*, 1858-04-17: 241.

③《世界插图报》在介绍图 5 时曾指出,该图的价值在于它与叶氏本人完全相似,“比琳呱(Lam-Koua)的油画肖像更加还原,更多地借用了高加索形式中的理想风格,而非纯粹的中国风格”(“Chine”, *L'illustration Journal Universel*, 1858-04-17: 241.)。琳呱的油画在当时的欧洲具有较大影响。

④关于人物肖像画遵循一定的套式的论述,参见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2 版,第 29 页。

⑤Deleuze G.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lated by Lester M. and Stivale 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61.

### 三 “英国性”主导下的表征:叶名琛形象的形成原因

《画报》对叶氏形象的塑造与其时代语境、自身定位和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画报》以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为主要读者,传播中产阶级价值观;以用艺术对读者进行道德教育为目标,并作用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感性。一方面,它迎合理想读者的已知趣味并对他们实施道德提升和情感教育;另一方面,它将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包装为整个大英帝国臣民的共同价值,获取其他阶级的认同与拥护。19世纪中叶英国报纸向下传播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sup>①</sup>集中表现为“英国性”(Britishness),其核心是“英格兰特质”(Englishness)——“它划定了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利益必须针对工人加以保护;它意味着拥有财产、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遵纪守法,反对暴力;是体面的和知足的”<sup>②</sup>。在本土报道中,《画报》突出的是“英格兰特质”,但当涉及英帝国海外殖民地、外交关系和世界政策时,它所传播的“英国性”便从“英格兰特质”延展为以英国本土为中心,以帝国为主体,与英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帝国认同紧密联系的“根深蒂固的、超越党派之争的国家利益观念”<sup>③</sup>。

#### (一) 受英国商业利益的驱使

19世纪中叶,英国推行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sup>④</sup>,其最大动力和终极追求可被浓缩为“自由贸易”与“商业利益”。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绝不限于英国实现在华“自由贸易”,而是“迫使清政府将违禁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借此扩大其在华合法贸易”<sup>⑤</sup>。帝国商业利益最大化是“英国性”的核心部分,也是影响《画报》塑造叶氏形象的关键因素。

对英国而言,无论是1849年的广州“入城”冲突,还是自1854年起的“修约”交涉,都在于进一步扩张其在华商业利益。叶名琛在处理相关问

题时的强硬态度和借故迁延令英外交官员满腹怨言,在书信中反复强调他的虚与委蛇、怙顽不悛。受此影响,《画报》编辑才会在首次对“亚罗号”事件的评论中就使用了一连串表顽梗固执之意的词汇,将冲突归咎于叶氏。此后,《画报》多次重复“顽固不化的叶氏”这一表述,使之成为一种固定搭配。

言说他者的实质是言说自我。《画报》坚信,若英中争端的结果“使东方的伟大帝国向西方更伟大的帝国开放思想和贸易,那么整个世界都将是受益者”<sup>⑥</sup>。它多次书写叶氏的顽梗执拗,强调他的决不妥协,事实上是在反复确认英帝国在华贸易的必要性和商业利益的优越性,是在反复表达它对英国在华商业活动遭到抵制的羞愤交加。“顽固不化的叶氏”形象上所投射的是从在华英商到议院大臣、从外交政策的影响者到决策者以及公众舆论对于进一步扩大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急不可耐。

#### (二) 捍卫帝国荣誉与尊严

叶名琛的“顽固不化”并不足以作为发动对华战争的正当理由。《画报》深谙只有给维多利亚时期拥有“自由主义良知”<sup>⑦</sup>的中产阶级读者提供一个重挫不列颠民族尊严、践踏大英帝国荣誉的“非英国性”具象作为靶子,才能赋予对华战争以合理性与正义性。直指叶名琛为“亚罗号”事件等英中冲突的始作俑者则符合了这一目标。

一方面,《画报》与同时期的《泰晤士报》《晨邮报》《环球报》等口径一致,渲染“亚罗号”事件中广州水师“降下英国国旗”带来的羞辱,极力强调叶总督傲慢执拗、寸步不让的态度是对大英帝国尊严的严重践踏。须知《画报》在首次报道“亚罗号”事件时,并未提及中国官员“降下英国国旗”。但后续的多篇通讯和社论都反复提及广州水师“降下英国国旗”或“降下英商船旗”(hailed

<sup>①</sup>Wiener J H. *The War of the Unstamped: The Movement to Repeal the British Newspaper Tax, 1830-1836*.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0-31.

<sup>②</sup>Morse D. *High Victorian Culture*.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p. 47.

<sup>③</sup>Darwin J. “Imperialism and the Victorians: The Dynamics of Territorial Expansio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97, 112(447): 614-642.

<sup>④</sup>Gallagher J, Robinson R.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3, 6(1): 1-15.

<sup>⑤</sup>Wong J Y.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55.

<sup>⑥</sup>“The Speech and the Address”, *ILN*, 1857-02-07:104.

<sup>⑦</sup>参见 Wong J Y.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3-215.

down the British flag/ensign)<sup>①</sup>。一般情况下,船舶主动降下国旗是投降的象征<sup>②</sup>;“亚罗号”被中国官员降下英国国旗,则是对英国人的巨大侮辱。因此,“这个象征性的行为似乎比更严重的拘禁船员的行为更加让议会的好战派怒不可遏”<sup>③</sup>。《画报》还在涉及“降旗”的文章中对叶名琛的顽固傲慢大肆渲染,以论证英方炮击广州是维护大英帝国荣誉的正当行为。尤其在3月初英国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之后,《画报》在社论中激愤地谴责议会是被“不爱国的情感”所利用的工具,申斥反对党出于党派之争而无视“英国国名的荣誉”<sup>④⑤</sup>;3月14日的社论则将科布登、迪斯累利等反战派置于“英国人民”的对立面,认为英国人民“在荣誉这一点上极度敏感”,“不会忍受任何侮辱”,故不会受其迷惑<sup>⑥</sup>。“降下英国国旗”这个中性的动宾短语在读者来信和其他社论中,也被附着了更为激烈的感情色彩:“对英国国旗的蓄意践踏”<sup>⑦</sup>，“英国国旗将被任何把它扯下(pluck it down)的野蛮人羞辱”<sup>⑧</sup>。越是强调“降旗”所象征的奇耻大辱,就越能凸显使英国国旗蒙羞的叶氏之可鄙可恨,也越能鼓动读者支持以武力证明“英国国旗的不可侵犯性和不可战胜性”<sup>⑨</sup>。

另一方面,《画报》引导读者坚信,只有“惩戒性的暴力行动”才能制服如叶氏一般暴虐野蛮的中国人<sup>⑩</sup>。叶氏处决“同胞”的手段尚且残酷如斯,何况是对付被他视为与“叛乱分子”沆瀣一气的英国人?粤港两地欧洲人因叶氏悬赏首级而死中求生的惨况便是“前车之鉴”。《画报》与以巴

麦尊为首的主战派论调一致,都强调残暴嗜血的叶氏将会“灭绝”不列颠民族,“要将我们这个讨厌的民族连根拔起”<sup>⑪</sup>。它在社论中煽动公众的恐惧和愤怒,并将投票反对巴麦尊政府的人称为“误入歧途的英国人”,斥责他们将“鼓励叶氏的凶残……让他以为能够侮辱这个伟大的国家并谋杀它的臣民而免受惩罚”<sup>⑫</sup>。因此,《画报》高呼,只有对华战争才能遏制叶氏对在华英人以及不列颠民族的灭绝之势,才能维护“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sup>⑬</sup>,以武力解除后患,是必要且正当的。

### (三) 鼓吹民族优越性

《画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初就宣扬,“英格兰与中国的冲突,是欧洲现代的、扩张的文明与东方古老的、排他的半野蛮主义之间的冲突”<sup>⑭</sup>。这鲜明的二元对立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人的民族认同完全吻合。他们在用欧洲的范畴对中国文明进行简单粗暴的分析后,便充分意识到进步、自由、文明的“英国性”与落后、专制、野蛮的“非英国性”之间的巨大鸿沟。中国成为“非英国性”的“他者”,而叶名琛正是“他者”的具象。《画报》对叶氏的贬斥,也是对“英国性/非英国性”二元对立权力关系中不列颠民族优越感和支配地位的彰显。

此外,《画报》对叶氏形象中“反人性”的强调,既是为了激发中产阶级读者的“感性”(sensitivity),促使他们从道德上谴责叶氏的暴行,也是为了宣扬英格兰人对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这种“感性”是具备良好教养和修养的人的性格要素,意味着富有同情心、仁爱之心和道德感<sup>⑮</sup>。《画

①英国商船旗(ensign)“相当于英国国旗,象征英国的主权和保护”。参见郝宇峰、杨凯峰:《“亚罗号事件”与晚清的中西法律冲突》,《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5年2月号。

②Anon. *A Naval Encyclopedia: Comprising a Dictionary of Nautical Words and Phrases; Biographical Notices, and Records of Naval Officers; Special Articles on Naval Art and Science*. Philadelphia: L. R. Hamersly & Co., 1884, p. 368.

③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周辉荣译,杨立新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0页。

④“Approaching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The ILN*, 1857-03-07; 204.

⑤“The Chinese Debates”, *The ILN*, 1857-03-07; 223.

⑥“Turbu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ILN*, 1857-03-14; 231-232.

⑦“State of Affairs at Canton”, *The ILN*, 1857-03-07; 201.

⑧“Notes of the Week”, *The ILN*, 1857-03-07; 205.

⑨“The Chinese Debate”, *The ILN*, 1857-03-07; 223.

⑩蓝诗玲:《鸦片战争(第2版)》,刘悦斌译,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第332页。

⑪“Lord Palmerston’s Speech, fourth night on ‘China’ in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March 3, 1857. Series 3 Vol. 144. Column. 1823. Available at: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857/mar/03/resolution-moved-resumed-debate-fourth>.

⑫“Approaching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The ILN*, 1857-03-07; 204.

⑬“Turbu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ILN*, 1857-03-14; 231-232.

⑭“The Speech and the Address”, *The ILN*, 1857-02-07; 104.

⑮Wickberg D. “What is the History of Sensibilities? On Cultural Histories, Old and N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7, 112(3): 661-684.



报》以被处决人数、骇人听闻的行刑手段和血腥恐怖的刑场环境烘托叶氏的杀人如麻,突出他与“感性”的全然背离。这些对“屠杀”和死亡的直白叙述所营造的惨烈氛围与维多利亚时代流行文学在书写死亡时所渲染的多情善感倾向大不相同。尽管它们直击读者“感性”中的悲悯之心,但相较于伤感,其所激发的更是对叶氏践踏人类生命的憎恶之情。《画报》亦多次通过盛赞英方人员的“人道主义”<sup>①②</sup>来反衬叶氏的暴戾恣睢。其潜台词正是“文明的”“仁慈的”英格兰中产阶级在道德层面远远高于“野蛮的”“残暴的”叶氏和中国人。于是,它把“人道”的外衣披在了“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sup>③</sup>的侵略战争之上,将其伪装成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规训和惩戒。

### 结语

19世纪中叶的《画报》整合了多种体裁的新闻报道、旗帜鲜明的新闻评论和具有独立表征形象功能的图像载体,在文字与文字、文字与图像、

图像与图像的互文中,塑造了较为直观和立体的叶名琛形象。这一形象成为“顽固不化”“残忍嗜血”的清朝官员的具象,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人对晚清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交汇。尽管“渊默镇静”的叶名琛肖像在一定程度上带给读者不同的观感,但它终究不可避免地湮没于由“英国性”主导的叙事中。《画报》中的叶名琛形象在激荡英国民族情绪、推动扩大对华战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折射出《画报》与同时期其他英国报刊的共同特点,其“新闻话语受制于隐匿的知识权力”,对真理的表达则“服务于种种特定的意识形态”<sup>④</sup>。其价值不仅在于展示特定历史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与想象,更在于提醒今天的读者:在考察诸如《画报》等西方新闻文本中的中国人形象时,须把握西方媒体为了实现特定意识形态目标而生产新闻话语的本质,也须认识到这些中国人形象是新闻话语与知识权力共构的结果,是对真实形象的“想象”与“变形”。

## Three Faces of Political Imagination: On the Image of Ye Mingchen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Ji N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represented Ye Mingchen as “obstinate”, “bloodthirsty” and “calm”. Ye’s image was construc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textuality and inter-pictoriality,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echo and resonance of the voice of *The Times* and political context, the regeneration of meaning realized by inner-textuality, and the possible meanings generat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e’s portrait o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nd his other portraits. Ye’s image was shaped by “Britishness”: it was driven by British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the mid-Victorian era, carrying the mission of defending the honour and dignity of the empire, and also preaching the superiority of the British nation. Ye’s image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images of the Chinese in western news texts.

**Key words:**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the image of Ye Mingchen; political imagination; text-image relations; Britishness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The Bombardment of Canton”, *The ILN*, 1857-01-03: 664.

②“The War with China”, *The ILN*, 1857-01-17: 39.

③《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④阎立峰,郑美娟:《权力与建构:新闻文本的意义生成与转换》,《现代传播》2022年第3期。